

中国思想通史

【魏晋南北朝隋唐卷】

辛 旗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 湖北省社会公益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

中国思想通史

【 魏晋南北朝隋唐卷 】

辛 旗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思想通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卷/辛旗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307-08319-6

I. 中… II. 辛… III. ①思想史—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②思想史—中国—隋唐时代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1431 号

责任编辑：朱凌云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马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25.25 字数：360千字 插页：4

版次：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08319-6/B · 288 定价：55.00 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辛 旗

字重光，满族，1961年12月生于北京，祖籍河北定州。“文革”期间在北京受小学、中学教育，1976年步入社会，曾在工厂、医院工作。1979年考入河北大学哲学系，后考入厦门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思想史、哲学、宗教学以及国际关系、台湾问题研究。1985年开始参与中央对台政策咨询，先后参加了对台政策白皮书、重要文告及有关法律的起草。多次赴美国、日本、欧洲诸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996年应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邀请赴美访问一个月，与美政、学界进行广泛对话。多次率团访问美国、印度、蒙古、朝鲜等国，就国际关系、地区安全问题进行高层对话与战略磋商。现任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宗教学会、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出版专著有：《诸神的争吵——国际冲突的宗教根源》、《中国历代思想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卷）》、《阮籍评传》、《文化新视野——看世界、论中国、说台湾》、《百年的沉思——回顾20世纪主导人类发展的文化观念》、《跨世纪思考——以台湾问题为焦点的综合研究》、《一个中国学者的世界话语》等。主编台湾问题论文集六部，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政论文、散文、诗歌以及文物鉴赏方面的文章等数百篇。撰写电视系列专题片《黑白魂——围棋与中国文化》、《自强之路——中国工业发展寻踪》等。曾在中央电视台国际卫星频道“海峡两岸关系论坛”节目担任嘉宾主持人。

总序

姜国柱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虽历经磨难，屡遭变乱，但终能由乱返治，使民族命脉繁衍不绝，生生不息，并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思想文化，为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这些优秀而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结晶，而且是人类思想文化宝库中的珍品。

中国哲学思想是一个不断发展，前后相承的连续体，它有艰苦探索的昨天，才有辉煌发展的今天，更有朝气蓬勃的明天。在中国思想发展的悠久历史中，向世人展示出它是：源远流长，绵延不断，思想纷繁，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影响深广的人类思想瑰宝。

中国历史思想的发展，与整个人类思想的发展一样，充满了矛盾，经历着曲折，它依赖于不同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而呈现出思想起落的阶段性，由殷周时代先民思想的萌芽和初期宗教观念的产生，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汉代经学的出现，魏晋玄学的滥觞，南北朝佛学与反佛学斗争的展开，隋唐时代思想的发展，宋明理学的创立，清代经世致用之学的深化，无一不呈现出哲学思想发展的阶段性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依赖性，同时又呈现出哲学思想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和思想的继承性。每个阶段思想的发展，都有其完整的发展过程，从观点的提出，矛盾的展开，范畴的演化，讨论的深入，到观点的论证，问题的解决，思想的总结，都有一个相对独立的逻辑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由于客观矛盾的发展和主观认识能力的深化，思想认

识发展经历着曲折和反复，肯定和否定，由低到高，由浅入深，而形成螺旋式的发展，波浪式的前进。这便是人类思想认识发展的共同规律，中国思想史的发展亦是如此。

在丰富多彩、纷繁宏大的中国思想发展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它虽然经历着漫长而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但却不是“周而复始”的简单循环，也不是万古一系的圣学道统的简单流年，而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的光辉结晶和人类认识真理的光辉记录。我们不论总观几千年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的各种思潮的历史发展，还是具体分析一个思想家思想发展的具体表现，都可以看出中国思想史上的若干认识的曲折性和波浪性，它充分地显示了中国思想发展的阶段性和内容的丰富性。

中国思想发轫之初，与其他地域的思想，虽有相似之处，但因社会经济、政治、自然环境诸条件之异，经过历代哲人智士的创造发明、增益充实，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独具特色，优异于其他民族的思想文化。中华民族善于吸取和消融外来思想文化，从不照搬照抄，而是经过加工、改造，使之中国化。外来思想文化到了中国，如不改变成为中国的模式，就无法立足、存在，因为我华夏思想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经济、政治根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性格和完整的思想体系。中国思想史不仅是国内各民族思想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晶，而且也吸取、改造外来的思想文化来丰富、充实自己体系的内容，如汉魏以后吸收和消融了佛教的思想，宋代理学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取佛、道二家思想，将儒、佛、道三家思想融为一体，而构筑成最完备而严密的理学思想体系。中国思想史在构成东方世界文明及对世界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和博学者，如春秋时期的老子、孔子、孙子；战国时期的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汉代以后的董仲舒、王充、王弼、向秀、郭象、范缜、王通、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玄奘、惠能、李觏、邵雍、周敦颐、司马光、张载、王安石、程颢、程颐、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陈亮、叶适、陈献章、王守仁、罗钦顺、王廷相、吴

廷翰、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颜元、戴震等。其人物之多，思想造诣之精微，理论体系之博大，思维程度之严密，都是外国中世纪思想家所无法比拟的，是世界思想史上所仅见的。只是到了明朝中期以后，由于封建社会步入了后期，封建统治者的思想禁锢，以及传统思想的某些消极作用的限制，而使中国仍停滞于封建社会，此时西方已进入了资本主义的时代，这样中国便渐渐地落后了。尤其是清朝统治者的反动统治，使中国这个伟大的文明古国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即使这样，中国清代也出现了龚自珍、魏源、严复、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梁启超、孙中山等思想家，他们首开风气，打破“万马齐喑”的局面，而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成为先进的中国人。

中国思想的发展，贯通古今数千年，对于这样恢弘巨大、内容丰富的思想发展史，要进行全面的历史的分析论述，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业，并近于不大可能。我们只能根据充分的历史资料，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遵循思想家所走过的轨迹，而进行探索研究、分析论述。

这部《中国思想通史》，依据历代思想发展、演变、思潮起伏、内容繁简而分为六卷。以华夏民族的思想认识为开端，论证中华民族思想的产生、形成、发展的历史演进的逻辑过程，以先秦时期为第一卷。汉承秦制，从社会政治到经济体制都是一脉相承，秦汉时代的思想，是为封建大一统的政治集权制立论的，故以秦汉时期为第二卷。魏晋隋唐时期，佛教传入、发展，道教建立、兴盛，儒学玄学化，儒、释、道三教，互争雄长，彼此攻讦，互相吸取，宗教思想颇为发展，故以魏晋隋唐时期为第三卷。宋元时期，理学创立，并形成理论严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故以宋元时期为第四卷。明代，理学进一步发展、完善，反理学思想亦进一步形成、发展，理学与反理学思想都在论争中深化、展开，加之明代思想研究专著尚少，故以明代为第五卷。清代，明清之际，天崩地解，群星灿烂，思想纷呈，清代晚期，即将步入近代，在历史变动时期，思想活跃，内容繁杂，为充分展现这一时代的思想内容、特点，故以清代为第六卷。我们之所以这样分卷，既考虑历史时代的划分，又

考虑思想发展的特点，尤考虑思想内容的繁简。因为随着历史的前进，思想的发展愈来愈丰富，所以从宋代以后而分为三卷加以论述。

中国思想史，就是中华民族思想发展的历史。纵观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思想文化，有的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古代辉煌灿烂，后来消沉式微；有的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近代煊赫震烁，古代却渺茫无迹；有的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虽中世纪繁华鼎盛，但却昙花一现，不久即衰落下去。唯我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历经阽危，而久盛不衰，并融合各民族、各国的优秀思想文化，而使之百川归大海，最终形成中国思想文化。中国思想史是中华民族优秀精神文明的集中表现。我们撰写《中国思想通史》，旨在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自豪感，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创造美好的未来。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魏晋时代概述	13
第一节 世族豪强的崛起	13
第二节 曹魏的法治政策与“门阀政治”	15
第三节 腐朽的西晋与玄虚的世风	18
第四节 东晋偏安与意识形态非皇权化	21
第二章 魏晋玄学	25
第一节 魏晋玄学的思想源流	25
第二节 何晏、王弼的贵无思想	38
第三节 嵇康、阮籍的反名教思想	44
第四节 向秀、郭象的独化论思想	49
第五节 裴徽的“崇有论”思想	55
第六节 玄学的历史地位及学术意义	59
第三章 魏晋道教	62
第一节 “百家”与道教	62
第二节 魏伯阳与《周易参同契》	72
第三节 葛洪与《抱朴子》	80
第四节 效法佛经的《列子》张湛注	92

第四章 魏晋佛学	104
第一节 汉末魏晋佛教传播状况	104
第二节 般若学与六家七宗	112
第三节 道安的思想	124
第四节 慧远的思想	131
第五节 僧肇的思想	140
第五章 南北朝时代概述	149
第一节 南朝的政权更迭	149
第二节 北朝的政权变迁	154
第三节 南北朝思想文化大势	158
第六章 南北朝佛教思想	164
第一节 竺道生的顿悟学说	164
第二节 涅槃学者对佛性的争论	172
第三节 《成实论》的基本思想	177
第四节 影响中国佛教发展方向的《大乘起信论》	183
第五节 三论学与禅学的思想	188
第七章 范缜的反佛教思想	196
第一节 范缜之前的反佛教思想	196
第二节 范缜的生平与论争背景	203
第三节 “神灭论”思想的主要内容	206
第八章 儒释道三家的论争	214
第一节 南朝宗炳的《明佛论》	214
第二节 南朝慧琳的《黑白论》与张融的《门律》	217
第三节 南朝顾欢的《夷夏论》与道士的《三破论》	220
第四节 北周甄鸾的《笑道论》与道安的《二教论》	223

第九章 南北朝道教思想	229
第一节 南北朝道教的发展	229
第二节 《阴符经》的思想	237
第三节 寇谦之的思想	242
第四节 陆修静的思想	246
第五节 陶弘景的思想	251
第十章 隋唐时代概述	257
第一节 隋代政权的变迁	257
第二节 唐代政权的兴衰	261
第三节 隋唐思想概要	266
第十一章 隋与初唐的思想家	272
第一节 王通的“三教可一”思想	272
第二节 傅奕的反佛教思想	280
第三节 孔颖达儒道结合的思想	283
第四节 吕才对方术迷信的批判	286
第五节 初唐的道教思想家	292
第十二章 隋唐佛教思想	300
第一节 智顗对天台宗的发展	300
第二节 吉藏的三论宗思想	310
第三节 玄奘与唯识宗的创立	316
第四节 法藏与华严宗思想	328
第五节 慧能与禅宗思想	335
第十三章 儒家复兴运动中的思想家	345
第一节 刘知幾的思想	345
第二节 韩愈的思想	352
第三节 柳宗元的思想	365
第四节 刘禹锡的思想	375
第五节 李翱的思想	384

绪 论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时代。从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黄初元年)到公元907年(唐哀帝李柷天祐四年)经历687年，伴随着无休止的战争，完成了自夏商周，春秋战国以来又一次大的融合——民族融合、文化融合、思想融合。这也是中国历史由乱到治，由治趋乱，由统一走向分裂，又由分裂回到统一之漫长过程中的一一个阶段。若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一时代可谓儒学(包括经学)、道家(包括玄学)、佛教、道教相互争斗、相互融合。虽然各代思想主流略有不同，如魏晋玄学，南北朝佛学，隋唐佛教和新儒学，但是，儒、释、道三家融合，中华固有思想与外来思想相互影响，各自脱胎换骨，重建适合于中国的独立的思想体系这一总的趋势，始终贯穿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全过程。

魏晋思想的主流是从汉末今文经学对社会腐败政治的批判以及古文经学对谶纬儒学的批判开始勃兴的。今文经学与士族知识阶层的“清议”相结合，酿成一股强劲的社会批判、怀疑思潮，其中典型的代表是王符著成的《潜夫论》。其后，仲长统引黄老道家思想向经学渗透，具有明显的离经叛道倾向^①，本末、名实、刑名学说的讨论代替了象数之学。古文经学则在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同时达到巅峰之际，戛然而止。虞翻将《易·系辞》已摆脱感性经验(卦象之具体说明)的“形而上”之义理，又用卦变、旁通、互体等方法，使其还原为可感可见之具体物象。易学如此之神秘、繁琐，昭示了

^①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90页。

经学已非抽象意义上的思想学术，而成为一种符号推衍的游戏。郑玄则相反，他是融贯古今文的经学大师。他突破了经学的象数模式和经验主义思路，以理性主义整理经学，引《老子》注释《易》，为经学向真正的“形而上”义理之学发展指明了出路。他首倡象数到义理之具体向抽象的思维发展过程中，应注重“无”、“有”、“自生”、“自成”、“自通”、“自彰”、“自得”、“理”、“本体”等概念。^①这种思想不仅开启了儒道互补的先机，更为有意义的是激发了魏晋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使汉代“集体的哲学”（经学为其主流）衍变为“个人的哲学”（玄学为其主流）。

与汉末经学衰落，玄学乍起之过程同时，中国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思想及其制度，这便是外来佛教之立足与内发道教之建立。佛教自东汉中期传入中土，依附于道术而流传，中国的知识阶层与统治者将其视为方术之一，其理论多被认定是黄老之学，“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②道教受佛教传入之刺激而由民间肇兴，将先秦的方术、巫术与老子哲学意义上的“道”相比附，利用汉末土地兼并造成的大批流民，于社会下层建立具有一定组织形式的宗教。如张角、张陵以儒、道、神仙家思想混合的《太平清领书》别立“太平道”，发起农民暴动，使东汉王朝土崩瓦解。到汉末魏兴之际，三国鼎立，各种思想有了充分发展、流传的条件。儒家思想仍然是从政知识分子必备的文化素质，虽被经学滞闭而趋向衰微，但仍有强大的社会基础。道家思想也因乱世之苦难成为知识阶层思维归隐之避风港。佛教因其思辨理论有助于摆脱繁琐经学，发挥儒道之义理，故开始为知识阶层所重视。道教则挟下层民众中有大量信徒之劣势，通过其教首领被割据军阀所利用，而逐渐得到世族豪强阶层的重视。一些重“夷夏之辨”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以其教抗衡初来中土尚未立足的佛教。儒、释、道已呈三足鼎立之势。

魏晋之时，儒、释、道先后进行了自身的改造，有了很大的发

① 郑玄：《周易·乾坤凿度》注。

② 《后汉书》卷三十下《襄楷传》。

展，虽然这些发展并不是表面以纯粹儒家、道家的理论形式去延续。儒学的独尊地位被儒、道结合的新道家——玄学所代替，玄学虽不能归属于儒学，但有相当程度的儒学特征，是对汉代经学之儒学的全面否定，以一种摆脱儒学的极端形式来扭曲地反映儒学在思想史上的演变。玄学诸人对人主体意识的认知萌生，开始从本体论而非汉代五行气说模式的自然生成论，去论证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玄学中名教与自然之辨是摆脱经学束缚，走入人格觉醒，建立抽象哲学最集中的体现。王弼、何晏、阮籍、嵇康、向秀、郭象、裴徽等人都从不同的角度力求去解决儒家“人本”思想与礼法社会的矛盾，他们无论自我如何标榜信奉儒家或道家，在理论方法上基本有一共通的特征：以道为本，以儒为用。道教势力由于与割据军阀相结合，开始依照儒家伦理礼教思想进行改造，成为士族化道教。在理论上，一方面为成仙寻找依据，遂有《周易参同契》谈内丹与养气的问题；另一方面，葛洪著《抱朴子》使道教的神仙信仰与儒家、玄学、黄老思想相结合，完成道教的理论体系。同时，道教徒为抗衡佛经的流布，要求道教依循中华古训和传统，有自身的古老观念之依据，于是便出现了仿效佛经形式的《列子》张湛注。佛教的传播依赖于佛经的翻译，佛经的翻译又与当时的思潮纠缠在一起。汉末佛经翻译已形成了两大系统，一是安世高系，为小乘佛教，重修炼精神的禅法，类似神仙方术；二是支娄迦谶系，为大乘佛教，宣扬般若空宗理论，类似于玄学。三国吴陈慧所撰《阴持入经注》，以“元气”谈佛理所谓万物变化之根源，以五行说喻五阴六情，从此书可窥见佛教与流行之阴阳家、道家思想相混杂。三国支谦曾重译《般若道行品经》，更名为《大明度无极经》，“大明”、“无极”取于《老子》中“知常曰明”和“复归于无极”。并且认为成佛就是通过般若（智慧）而达到与“道”相合，也即与“本无”（真如）相合，这种成佛即体“道”的观念，与老庄学说相契合。

魏晋以来，中原地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知识阶层中盛行以老庄思想为主旨的玄学本体论思想。受此影响，佛教一直到东晋后期，始终是般若学占主导地位，宣扬“空”（无）的佛理。玄学流派的争论与分歧，使得佛教般若学思想亦发生了分化，形成“六家七

宗”。这些派别的区分基本上可以和同期玄学各派的分歧对应起来。“七宗”大致为三派：本无，心无和即色。本无与玄学家王弼的“有之所始，以无为本”^①相合。心无与玄学家崇有论裴徽的“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②相合，主张“无心于万物，万物未尝无”。^③ 即色与玄学独化派郭象“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耳”^④相合，主张万物是因各类条件缘会而成。魏晋佛教般若学经历“格义”、“六家七宗”到“不真空论”等几个阶段，是佛学从依附玄学到摆脱玄学而走向独立的过程。道安不赞成以儒道概念直接比附佛经名相的“格义”方法，他竭力用中国传统思想的观念去理解佛教真谛，并以此摆脱玄学、儒学对般若性空说的束缚。慧远则偏重调和儒学与佛学的关系，主张释迦与尧孔“归致不殊”。^⑤ 僧肇从玄学与佛学之合流，去理解大乘龙树学的“中观”理论，开始在理论上，对以往玄学化的般若学进行澄清，使佛学既完成了概念理解上的中国化，又从玄学中彻底独立出来。他作《不真空论》指称，本无过分偏重于无，心无未否定外界事物之存在，即色以事物现象为实相，以上三派均将“有”“无”对立，般若真义应是亦有亦无的“不真空”。

南北朝时代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全面冲突的时代，这种冲突大都表现为各个领域具体问题的宗教式的论战以及皇权直接参与的大规模政治迫害。南北朝分裂之态势使原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吏治体系受到了极大的破坏，频繁的战乱与改朝换代使以礼法伦理为中心的儒家学说失去了治世的功用。中国西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几乎斩断了儒学传承的统绪，因为，他们用武力推行佛教。当然，也有些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华固有文明相融合，如北魏的全面汉化政策和尊崇道教。但是，南北各朝政权一旦完成了统治根基的巩固，

① 王弼：《老子注》第四十章。

② 裴徽：《崇有论》。

③ 僧肇：《不真空论》。

④ 郭象：《庄子·在宥注》。

⑤ 《弘明集》卷五《沙门不敬王者论》。

其内部不论汉民族抑或少数民族贵族竞相利用不同的宗教学说争权夺位。儒学仅成为各朝的官员制度和行政管理的准则和依据，根本取得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而佛教与道教成为意识形态之争的两个恒常的主角，儒家仅在伦理忠孝方面对佛教做些政治上的攻讦，在理论上几无建树。

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基本是通过与道教的结合，抵抗佛教对中华固有文化侵蚀来发挥其作用的。魏晋后期，一大批儒家知识分子转向道教，葛洪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仅是道教理论的整理者，也是儒学的改良者。他希望能在流行于世之道教形式下“兴儒教”^①，复兴以君臣关系为中心的儒家纲常名教，以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和严正谨肃的伦理来结束分裂战乱的局面。继葛洪之后，许多道教中知识分子注重儒家经典的研究，寻找其中有利于改革道教的部分，特别是名教，此时被视为建立道教规范礼仪的范本。北魏的寇谦之对道教大幅改革，“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专以礼度为首，加之以服食闭练”^②，把道教从地方割据势力政教合一的组织形式变更为服从皇权、受命于朝廷的宗教组织。寇谦之曾向北魏重臣，大儒崔浩请教儒理，表白心迹，“吾当兼修儒教，辅助太平真君，而学不稽古。为吾撰列王者政典，并论其大要”。^③他强调道教应秉持“教生民佐国扶命”的责任，道教徒应恪守“臣忠子孝，夫信妇贞，兄敬弟顺，内无二心，便可为善，得种民矣”。^④南朝陆修静以儒家的礼法为主，制定道教的斋戒科仪，重整南方的天师道，提高了道教的政治影响力。宋、齐二朝尊信道教的帝王很多，朝廷士大夫奉教者不可胜数。稍晚于陆修静的南朝陶弘景用儒、释、道三教可融的思想，总结了以往的道教思想理论。他认为“万物森罗，不离两仪所有；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⑤他十分重视儒道的融合，

① 葛洪：《抱朴子·嘉遁》。

② 葛洪：《抱朴子·应嘲》。

③ 《北史》卷二十一《崔浩传》。

④ 寇谦之：《正一法文天师教诫科经》。

⑤ 《茅山长沙馆馆碑》。

深入研究汉代经学，曾著《孝经论语集注并自立意》、《三礼序并自注》、《注尚书毛诗序》等。所著道教典籍或在体例上模仿经学纬书，或在内容上讲及纲常名教。他将礼法观念贯穿于道教的谱系之中，建立了与社会等级对应的神仙等级制度。陶弘景的努力使道教在高深理论及浅显仪规两方面都更接近于当时流行的佛教，道教真正具有了与佛教抗衡的宗教实力。

南北朝时代，佛教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继东晋、十六国时般若歧义繁纷，各类佛典随着中亚、北亚游牧民族的南下而纷至沓来。专攻某一经论的风气日炽，独尊某一经论的经师、论师，各立门庭，相互争鸣。在南朝，涅槃师取代了般若学的主导地位，到梁代盛极一时，同时三论师与成实论师兴起，到陈代首推三论。在北朝，以涅槃师、毗昙师、成实师、地论师、摄论师为主。在佛学思潮演变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涅槃学，“涅槃佛性”问题可以说是南北朝佛教理论的中心问题。从般若学转向涅槃学，从探究“空”到注重“有”的转折关头，竺道生主张“真空”、“妙有”契合无间，结合玄学化般若中观思想，将佛教本体论与心性学说联接起来，以顿悟学说解决了主观心性与客观本体分为两截的问题。带动思想界从重视本体之学转向研究心性之义，重视修行中的主观内心体验。正因为道生的作为，中国学术界开始自觉地接纳佛教思想。南北朝时，中国僧人独创之《大乘起信论》反映出一股清新的潮流，即中国传统儒家性善说与佛学相融，构成理论与践行并重的体系，成为隋唐各宗互相融通的基石。

南北朝三教的冲突是十分激烈的，尤其是佛教因各地割据与分裂政权的推崇，势力日盛。不仅对政治产生影响，更有寺院经济与中央财政税收相对抗，导致一系列问题。加之，文化差异始终与政治利益、权位的争夺纠缠在一起，儒释道三家都明了“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道理，竭力争取在朝廷中的地位。起初，一般采用御前会议的形式三家辩论短长，其后，排定优劣先后。然而，往往是最终以政治势力参与其中采用暴力方式重定三教顺序。南北朝时期，佛教与道教始终在争夺宗教地位（一般为国师地位），儒家虽在理论上反佛，但地位一直较稳固，即与官吏系统紧密结合，对国